

「想起來了，然後呢？」

一 精神分析取向政治暴力創傷療癒

轉型正義再詮釋威權時期的真相有不同層次，而在個人史與家族史中，有更複雜的真相。這些遺落的人生故事，對關係至關緊要，必須好好處理。否則政治暴力事件即便成為歷史，但創傷仍以不同的方式，成為社會中的現在進行式。我們要知道的真相，不僅在於事件發生的始末，更是受害者主體的真相：這個主體經歷了什麼？或許它從來無法語言化、也無法傳達給對話的對象。雖然這不是國家與政府最重視的真相，卻是心理工作者關注的焦點。

摘要：

面對創傷

關於如何面對創傷有三個面向：一、害怕面對，特別是規模很龐大的創傷。我們想像它是不可觸碰的；二、強調正向地面對，不要耽溺。三、只有真相可以帶來療癒。但是否挖出真相、重建真相，將真相完全攤開在世人面前的時候，療癒就會發生？

記憶政治具有某種爭議性，到底誰才是受害者？慰安婦的受害者，跟二二八的受害者、白色恐怖的受害者、國共內戰的受害者、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、日本皇軍的受害者、納粹的受害者。這些受害者有時候不會有立場上的對峙，但有時卻是對峙的。到底誰是我們？誰是他們？誰是跟我們對峙的人、誰是跟我們同一陣營的人？事實上並不是那麼容易被切割的，但我們往往以為那是可以被切開的。

我要提醒的是，一個歷史事件不是只有加害者跟受害者而已。即使是在二二八跟白色恐怖裡面，我們常以為好像他就是一個受害者跟加害者，或者是加害體制的一個對峙，好像只有這兩邊的人需要想起來。然後，其他人就無關。但真的跟我們無關嗎？我們絕大部分的人只要覺得家裡面沒有二八或白色恐怖受難者，我們就會以為自己離這段歷史很遙遠。可是在我們的臨床工作、田野調查裡面，就會發現，即使是這些受害者的後代、二代跟三代，他們對這個歷史無知的程度，跟你我都差不多，以至於他們也覺得好像跟我無關。但是你問起來，才突然發現其實是與自己家族相關。

政治暴力

什麼是政治暴力？現在世界各地，跟政治有關的暴力，不見得是國家。所以，我們稱之為組織型暴力。也就是說，握有實質政治權力的群體或個人，為了鞏固他自己的私利，有系統地運用他的資源，在各個層面上去壓迫個人或者是弱勢的群體，然後在不同層面上加以滅絕，這在最近維吾爾的集中營中會看到。

轉型正義的學理很複雜，但核心在於，我們過去是威權的政體。今天我們民主化了以後，很重要的，我們怎麼重新去命名這件事？過去做那個事情是不正當的，他哪裡不正當？必須要重新去定義它。

善後工作

這項不正義，我們除了去命名它之外，對於它遺留下來的傷害、傷痕，我們怎樣去辨認？這也是善後工作一個很重要的事情。大家也會看到。真促會要釐清歷史真相，有歷史真相才能思索如何面對。的確如此，但是我們也要有心理準備，我們到底怎麼去釐清這個歷史真相？我們的根據是什麼？我們根據的是檔案嗎？檔案有沒有可能是說謊的？之前有一部片子叫做《不是自己寫的日記》提到，線人怕被處罰，而變成是迫害的人。所以，檔案描述的事情是否是真的真相？我們要怎麼去比對真相？檔案不足的時候，我們的口述歷史到底可以揭露真相到什麼時候程度？其次，這個真相到底是以社會的角度來觀看？還是我主體角度的真相。這個真相的層次可以剝開到哪個層次？基本上，我會認為，如果是以國家的角度來看，他不會進到受害者的主體的經驗層次去看他的真相。但是對一個心理工作者來講，這個層次是重要的。這個大概是我們跟一般在想像做轉型正義工作很不一樣的地方。再來，就是說怎麼樣去跟過去的這種統治的手段，做一個切割，有辦法嗎？

轉型正義跟心理療癒的關係

基本上會有轉型正義的階段論。面對真相，重新去定義體制的的正義，跟過去的威權體制作切割，進入到民主化的思考，清理過去各層面的遺緒，包括制度上的、習慣，以及包括思想遺緒的清理，再下一步就應該要走到和解。當然還有平復創傷，好像大家認為平復創傷是比較可以跟心理療癒扣在一起的。好像其他面向就沒有。好像關於真相的討論。不太需要心理面向。好像關於清理遺緒這件

事情跟心理無關。可是真的是這樣？我一直希望挑戰這件事情。其實心理的工作與很多層面相關。例如楊翠老師常講的，最大的銅像是在我們心中，這是最難解決的。

轉型正義的心理療癒中，必須要注意到加害跟受害者的對立。怎麼樣可以超越？怎樣回到人的水平來看彼此。就是，我們現在會批評國民黨，國民黨會說我們現在都已經民主化了，不是嗎？我們現在是在野黨，我們現在是執政黨監督者。困難在哪裡？如果說，接受黨國教育的這群人的自我認同很難被拆解。大家想像一下，如果你今天是在國民黨的體制裡面，跟你的家人都是所謂的深藍，你從小就出生在這樣的環境裡，從小覺得這樣才是好的。就是作為一個國民黨支持者，才是善良的。然後，今天你突然告訴我說，國民黨做很多可怕的事情。我要怎麼想像我的祖先？可是，我的爸爸媽媽或我的爺爺奶奶，他們是如此慈祥和藹的人。我怎麼可能相信他們手上有血腥？你沒辦法相信。最本能的反應就是你們都騙我，你們誇大了。我們現在有一個氛圍，認為他們不承認，他們就很壞。很容易就跳到一個極端去妖魔化所有國民黨的行動者。

我覺得如果沒有辦法花力氣去理解。到底這樣身份認同建構裡面，他們維繫著的核心是什麼？我們都需要把自己嵌在某一種比我更大的歷史裡，我們才能找到在這個世界上佔有的位置，只是，我們怎麼樣去想像這個更大的歷史架構是什麼？他可能是國民黨、中華民國，也可能是台灣，也可能是社會主義。五〇年代的前輩們相信，社會主義才能夠救全世界。但問題或許不在於我把自己嵌在一個比我更大的信念或是信仰。問題在於，當這個信念跟信仰必須被想像成全善的、無堅不摧，必須要被捍衛的時候，問題就出現了。可是，如果從心理的角度來看，我們為什麼會需要那樣？為什麼會需要把一個全能的、全知的、全有的，超越我的一個大我扣連在一起。這個心理需求是哪裡來的？如果沒有辦法知道這件事情的話。我覺得沒辦法拆解現在碰到的困境。

主體的真相

我們需要知道的真相，不是這件事從頭到尾發生了什麼？我們要知道真相是主體的真相。是這個主體，他曾經經歷了什麼是從來沒有辦法語言化的？從來沒有辦法達到對方那裡的。對我來講，這個才是我們要找的真相。

政治暴力創傷，根本沒有過去。它到現在還活在這些人身上。當事者過去以後，這些創傷還在他們的二代，甚至三代的身上。有時候不見得用那麼明顯的症

狀方式呈現。但是它並沒有消失。政治暴力創傷是現在進行式，它用不同的方式留在我們社會裡，不只是在當時的家屬身上。心理師或廣義的心理工作者、助人工作者其實能夠做的事情很多，但我們現在並沒有一個想像，在轉型正義的工程裡，有大家可以站立的位置，大家都能貢獻的位子。似乎，我們還沒有辦法想像，可是我覺得這其實是我們的責任。

創傷的後延現象與代間創傷

創傷不會是線性的，我今天在那邊經歷什麼，然後我馬上就會出現什麼症狀。它有所謂的潛伏期，或者是它的路徑，可能是跟後面發生的其他的事件關聯在一起，產生奇妙的化學變化，之後才出現別的狀態，也就是說，創傷會是生命的堆疊。你會發現創傷的症狀展現一種後移性，這是佛洛伊德所說的，創傷的症狀顯現。主體如何詮釋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？發生轉變的時候，這個症狀會跟著轉變。我所說的意義，包括意義的無法發聲。就是他怎麼樣被卡在這個意義的無法、無法發聲裡面。

即使是家內的創傷，我們以為他是私密經驗的創傷嗎？也不是。當我經歷這樣的事情，那為什麼會說不出來？因為我認為這個社會沒有人會懂我經歷的事情。大家沒有想要聽這個，或是說，我一但要說出來，我就是要指責我的父親。然後，他會動到整體的人際網絡。他會動到是我生命全部的秩序。我如果講出這些事情，是不是要被通報，我的爸爸是不是，就要去上法庭。他會發生什麼事情。他被關了以後，我們家怎麼辦？所以它不是單一的，即使是性侵的創傷，他都不是那麼單純的只是一個私密事件的創傷而已。他要被講出來，他要被銘印，他要在被理解的過程裡面，這都已經是社會實踐。它的社會面向、歷史面向都已經在。以性侵為例，受害者可能可以在某個氛圍下說出來，但這個距離受害者可以公開地說，誰是我的加害者，跟希望這樣的事情被處理，還是有很大的距離。為什麼？因為還在妖魔化加害者，這對於家內性侵的受害孩子來說，只要外面的社會繼續妖魔化她的爸爸，她就永遠說不出。所以這是一個社會面向的事情。

這不是說我們要跳入另外一個極端，好像開始同理加害者，認為他不需要負責任。當然不是這樣。對我而言，這就是威權遺緒，但如何面對威權遺緒，除了二元對立的分化之外，有沒有第三條路，才是重點。

創傷絕對是在關係向度裡面發生的。受害者或關係中的主體需要找到一個人，然後發現這個人可以聽得懂他發生了什麼事，就這樣而已。光是這個關係的向度

出來的時候，他的傷會長得不一樣。他可以試著用別的方式去，去移動自己跟這個傷的位置。我們治療就是在做移位的事情。我們不是把傷變不見，而是移動這個主題跟他傷的位置。以及他去描述這些事情的角度突然可以變得比較多面向一點。

我們會嘗試成為對方的戰友，而不是在運用專業技巧在聆聽。我用專業技巧在聆聽，對方馬上會知道。甚至對方搞不好會做得比你更好。所以，我們的專業訓練，並不在訓練你有某某大師的樣子。專業恰好就是在訓練你，在未知的狀態下，你怎麼有辦法同時 hold 得住你自己，以及把一個聆聽的空間為對方打開。我們的專業訓練是這樣，不是在預備告訴你說，對方講什麼的時候，你要回什麼？這樣會死得快。因為你在背公式。背公式就會死得很快。

漂浮式聆聽

我們講漂浮式聆聽，或注意力均等聆聽。也就是說，我們不去重建你自己的生命故事，去做另外一種版本。我們的指導語只有一個，就是把你現在腦袋裡面所有飄過的語言都講出來，就這樣，當然這很挑戰。因為我們都會想要聽線性的故事。我們喜歡聽線性的故事，以為這樣比較有成就感。我永遠不會對你的掌握，超過你自己，所以善意中立，不判斷。但我們講善意中立並不是說，我完全不做價值判斷，而是當他為什麼今天此時此刻把這件事情帶到你面前來，他想做什麼？他是為了告解嗎？他是想從你那邊得到原諒嗎？替代式的原諒嗎？有太多的面向可以去探索的。有些個案的確會說，你告訴我，我要怎麼做。但通常這就是一個陷阱，你給他答案的時候，他就會生出另外一個症狀，很多就是這樣。

另外一個關於主體的真相是，他回來的真相，不會是那時候的真相。因為永遠都是現在此時此刻的真相。所以他告訴你不是說三十年前的時候，我在監獄裡面，我怎麼樣被刑求。是現在這個人在告訴你，所以他在講那個時候，他也在講此時此刻。所以，意思是我嘴巴再怎麼厲害，我再怎麼會使用我的語言，我都沒有辦法重現這個真實。所以一定有東西會掉出去。我沒有辦法撈回所有真實的片刻。這是見證的不可能性。所以做見證，同時也是一個哀悼的歷程。我要哀悼的是，我再怎麼講也只能講到一個程度而已。別人再怎麼理解我，他也只能理解到一個程度而已。

言說的主體是欲望的主體

因此，當我們創造一個讓言說發生的空間的時候，重點不在我的敘事內容本身是什麼，而是這個曾經被剝奪的主體。曾經主體性被剝奪的這個主體，有沒有辦法把他的主體性重新找回來。所以，不是他講了什麼內容。而是他有沒有辦法在我的這個治療空間裡面找回他，他知道他是可以發話的。他相信自己可以發話，而他發話以後不會有人來再來摧毀他。言說的主體就是欲望的主體，當他找回他言說發話的可能性的時候，不管它內容講的是什麼，不管他能夠講到百分之多少，我們永遠不會知道，可是如果他的這個發話的主導權、主體性找回來的時候。他才會能夠開始說，我要什麼。所以對精神分析來講，言說跟欲望主體是同時發生，是同一件事。我允許自己發話的時候，我也才能允許自己承認我欲望的方向在哪裡？治療師可以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情，當這個主體發現：我可以了，我可以替我自己發話的時候，他便可以離開我。